

「歷史與敘述」研討會致詞

本研討會的源起是因為今年清華大學由人社院提名，而經審查委員會一致通過頒予金庸先生名譽博士，人社學士班蔡主任與中文系劉主任建議配合頒授名譽博士學位盛典，與歷史所合辦「歷史與敘述」研討會，以表慶賀。當初是期望有最具影響力華人作家美譽的金庸先生能共襄盛舉，不意金庸先生因健康狀況不克來台領獎。雖然最後決定將頒授典禮改於本月十九日在香港舉行，但辦理研討會的計畫不變，有呈示金庸小說在文史傳承發展中的地位重要意義，很高興能恭逢盛會。

清華大學於民國十四年成立清華國學院，自王國維、梁啟超、陳寅恪、趙元任四大導師以還，史學大師雲集，在史學界建立起屹立不搖的地位。陳寅恪先生〈王國維先生紀念碑銘〉有云：「士之讀書治學，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發揚」，揭櫫「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。我國素有春秋史筆，亂臣賊子懼的說法，要以發掘真相，求真實供鑒誠。梁啟超先生有言：「史者何？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，校其總成績，求得其因果關係，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也」。另一方面，近世著名哲學家克羅齊（Benedetto Croce）說：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」（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），認為往事只有在當代生活中發揮作用才成為歷史。因此，同樣的歷史在不同的時期會有各自的詮釋。在專制時代，湯武革命是否「弔民伐罪」，商紂是否「酒池肉林，暴虐無道」，評價是否公正客觀讓人存疑，秦始皇「焚書坑儒」，豈無「藉政治黑手統一口徑」之心；中國歷代均設置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，司馬遷在殘暴的漢武帝虎視眈眈下修史，能把漢高祖劉邦寫的血肉真實，殊為難得，想必也有難言苦衷；司馬光撰《涑水紀聞》，在宋太宗子孫當朝之際，就「燭光斧影」公案難免有為尊者諱之嫌。《漢書》開創了斷代為書的先河；「斷代史」由史官編纂前代王朝的官方歷史，評述前朝政事，危疑較少，較易發揮。然而，蜀漢亡而徵入西晉為著作郎的陳壽編寫《三國志》，尊被迫禪讓給晉的曹魏為正統，自不為奇；乾隆朝編纂《四庫全書》，「全毀，抽毀，剝去以外，並且刪改古書內容」，以求政治正確，「不但藏之內廷，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，使天下士子閱讀」，又是對史料之另一番摧殘。所幸這些史料問題，在民主自由、資訊發達社會大有改善，但「曾子殺人」，「謊話講一百次，會讓人以為是真的」，在現代社會也屢見不鮮。

本研討會以「歷史與敘述」為名，點出歷史分記述史實與研究敘述兩部份。這也是歷史迷人處，每個人、社會、國家、甚至人類與宇宙萬物，都有過去，都有歷史。即使以人類有文字記載以後時期為分界而稱歷史，然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」，則是向來史家所寄。歷史有必然卻又充滿了偶然，大家都常問，我們所讀的歷史是否是信史，真相為何？是否有定論？歷史有長久的合理性嗎？歷史發展是否具有規律性？歷史是循環的嗎？英雄造時勢，還是時勢造英雄？歷史的教訓有用嗎？讀史能使人明智嗎？一連串的問題，都可有膾炙人口，正反不同說法。

尤其有趣的是，人人可插嘴，本人一向對歷史學者最為敬佩，因為歷史學者要功成名就，必須藝高膽大，方能殺出重圍。最重要的，歷史意識的養成，其功能就在於歷史學者能透過歷史的敘述而形塑記憶、進而凝聚認同，乃是近代史學家公認的課題。

歷史的敘述可有多種形式，古典小說如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紅樓夢》對其背景時代以及人物都有很深刻的刻劃，其影響可能比正統史家所言更為遠大。熟讀金庸先生小說《越女劍》、《天龍八部》、《射鵰英雄傳》、《神鵰俠侶》、《倚天屠龍記》、《碧血劍》、《鹿鼎記》、《書劍恩仇錄》的讀者，對范蠡、西施、北宋時代大理國、契丹族、成吉思汗、南宋襄陽守將、朱元璋、崇禎、袁崇煥、康熙、吳三桂、乾隆不免有新的認識與觀感。金庸先生在後期，也多有改寫之舉，似是提醒世人，不可照單全收。據了解，金庸先生改寫重點在邏輯性與合理性。這也說明歷史研究，除發掘史實外，敘述邏輯性與合理性的掌握，也很關鍵。另一方面，從不同角度看歷史，饒有新意，也會讓人欣於所得，沉吟不已。最近我閱讀大陸作家李開元所著《秦崩》一書，提到漢高祖比秦始皇僅小三歲，他們有四十七年是並存於世的幾近同齡人，秦朝歷時十五載，秦始皇死後三年而崩，楚漢相爭不過四年，而項羽自刎烏江，僅得三十歲；李斯聰明一世，年過七十歲，仍參與合謀易儲，不二年就被腰斬於咸陽；至於趙高，深受秦始皇器重，主謀沙丘之變和望夷宮政變，沙丘之變不滿三年，「指鹿為馬」，並誅秦二世迎立子嬰繼位，然而子嬰即位五天後，趙高即與家人同遭處死，讓人有「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？」之嘆。杜牧〈阿房宮賦〉有云：「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後人哀之；後人哀之，而不鑑之，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」，歷史興亡更替有如此者。

學歷史講求史料證據，人類發源可上溯源遠流長，然文字發明迄今只有幾千年的時間，在有文字以前，要了解史前社會考古學是重要途徑。甲骨文的出土，促進了各國學者對中國上古史和古文字學等領域的深入研究。王國維先生利用甲骨文的實物資料證實了司馬遷《史記·殷本紀》中對商朝的記載，即自商湯建國到商紂滅亡，有三十一王，歷經六百多年；同時，也更正了一些《史記》中的錯誤。目前在清大擔任駐校作家的岳南先生，正是能將歷史與考古新發現融進自己的文學作品中，並在讀者、考古及歷史學家中引起注目的知名作家。從敦煌石窟到漢墓，從定陵到秦兵馬俑坑，從大國衰榮到滄桑歷史……，先後出版的《風雪定陵》、《萬世法門》、《復活的軍團》、《日暮東陵》，及《尋找北京人》，深受讀者歡迎。其中《復活的軍團》和《風雪定陵》被譯成日、英、韓、德等國文字出版；《風雪定陵》獲一九九六年《中國時報》開卷版「十大好書獎」，銷售量高達十七萬冊以上，勤於筆耕的他，為讀者在古今交織與中外錯綜的敘事宏構裡，重現古帝國的文明。今年六月時報出版社出版岳南先生《南渡北歸》，是以民初到內戰時期知識份子遭遇為主題的巨作。時報出版社為本套書所出專刊中，列舉二十八位學術大師，其中至少有十九位為清華人。從一個清華人的觀點來看本書，感覺處處皆見清華人，遍地皆為清華事，情節扣人心弦。岳南先生有意以三年時間，

撰寫《梅貽琦大傳》，兩岸清華共同永久校長的行誼，在岳南先生史家筆下將得以廣為流傳，這是所有清華人所深切期待的。

在《風雪定陵》與《南渡北歸》中，敘述清華人因歷史進程的變化而下場悽慘者所在多有，其中，某些歷史公案往往由於政治的需要而進行論斷，牽涉之人甚至因而慘遭奇禍。如當年清華激進教授吳晗，在共軍進佔北京後，曾奉命接管清大，隨後又接任北京市副市長，先是應毛澤東鼓勵，頌揚明朝諫官海瑞的直言敢諫，但文化大革命期間卻因為《海瑞罷官》劇作而被當權者批鬥，最後不得已在獄中自殺，家破人亡。另外，太平天國領袖李秀成是忠是奸，各方引經據典，爭辯不休，最後是由毛澤東號稱「鐵證如山」而拍板定案。政治干涉學術橫行不已，益發彰顯陳寅恪先生一生治學秉持「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的可貴。可悲的是，陳寅恪先生亦不能見容於當道，晚景淒涼，在文革批鬥中，滿腔悲憤離世。「後人哀之，而不鑑之，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」，清華人「典型在宿昔」，自當惕厲奮發，承先啟後，光大前人嚴肅治學精神，為往聖繼絕學。